



美国教育的内卷



意见领袖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本文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郭凯的一篇读书笔记。通过探讨《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这两本聚焦“贤能制”来讨论美国教育的书，作者对“内卷”和“鸡娃”等时下大热的社会话题作出思考。

“贤能制”指的是一个社会不问出身，任人唯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内卷”描述的是一种在微观尺度上不断演化改进看似有进展，但在宏观尺度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所有微观的演化改进从宏观尺度看来类似于零和博弈。

但在美国，当贤能制遇到内卷，就成了一个有毒组合，突出体现在教育上。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都反映了：贤能制看似可以让所有人只要努力就能成才，但这在分化的社会下其实是个假象。随着过去 40 多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分化，贤能制看似公平，但反而成了固化阶层和优势的工具。美国家长们的焦虑并非怕孩子受不到好的教育，怕的是社会分层。

两本书开出药方的指向高度重合——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但在郭凯看来，两本书对贤能制弊端的揭露远超过这一药方，因为问题的根源似乎在于美国社会的分化，而社会分化的根源要远比两位作者主要关注的教育

和工作更加复杂。

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似乎也是很多中国家长的状态。郭凯强调，中国如果要避免美国遭遇的“贤能暴政”或者“贤能陷阱”，就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公平、公正、具有流动性和安全感的社会。



贤能制 (Meritocracy)，也叫优绩制，指的是一个社会不问出身，任人唯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在很大意义上，中国的高考可以算是一种贤能制，考卷面前人人平等，高考能否成功取决于考生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内卷 (Involution), 描述的是一种在微观尺度上不断演化改进看似有进展, 但在宏观尺度上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有微观的演化改进从宏观尺度看来类似于零和博弈。

有观点认为, 中国一些学生的高考模式就是内卷, 学生在应试的准备上越发精益求精, 高考的成绩越来越高, 针对高考的竞争越来越提前, 但最后能被“985”“双一流”“211”高校录取的学生还是那么多。

所以, 贤能制和内卷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教育。当贤能制遇到内卷, 就成了一个有毒组合, 突出体现在教育上。这是我最近读了《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两本书后得到的印象。

前一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网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他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开设的“公正”课一段时间在国内也很流行。后一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丹尼尔·马尔科维茨教授。两位教授都是美国顶尖大学的教授, 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都是典型的贤能制的赢家, 却不约而同地用“暴政”和“陷阱”这样负面的词汇来描述贤能制。

当然, 他们讨论的都是美国的教育, 与中国并不相关, 但他们指出的问题值得重视。

现象: 美国社会对教育的焦虑

桑德尔的《贤能暴政》从 2019 年震惊全美的大学入学舞弊案说起。

事情大致如此:

一个叫威廉·辛格的人从一些富裕家庭收费（几万到百万美元不等），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和好莱坞明星，比如出演过《绝望主妇》的艾美奖获得者菲丽西提·霍夫曼，以及出演过《欢乐满屋》的洛莉·路格林，然后辛格通过买通监考官（从而帮助学生在 SAT 考试中获得高分），或者贿赂体育教练（从而帮助学生获得体育特长生的资格）等各种不法方式，帮助这些家庭的子女被耶鲁、斯坦福等名校录取，美其名曰“走侧门”。威廉·辛格生意做了 8 年多，生意的收入为 2500 万美元。

桑德尔举这个例子的含义是多重的，它体现了美国名校录取的激烈，它体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它更体现了美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以至于为了进入名校可以不择手段。

马尔科维茨的《贤能陷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曼哈顿有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学费高达每年 5 万美元以上，但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鹜，使得这个幼儿园的录取率不到 5%，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还低。因此，多数家庭为了提高录取的概率，还得雇“教育顾问”，这些顾问的价格可能高达 6000 美元，帮助设计方案。通常这些顾问会建议一个家庭申请 10 个幼儿园，向首选的 3 个在提供正常的申请材料的基础上还要额外写“情书”，仔细分析这 3 个幼儿园的特点，从而使得申请的材料和“情书”能够给幼儿园留下深刻印象。读到这里，美国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立刻跃然纸上。

为什么美国的家长会如此焦虑？以至于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开始激烈

争夺，甚至不惜冒违法的危险帮助孩子被好的大学录取。如果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似乎很难解释的通，毕竟美国的教育资源很丰富，好学校也不少，竞争的激烈程度似乎不应该那么高。

原因：社会分化下的贤能制导致美国阶层固化和教育内卷

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本是等级森严的地方。在二战之前的很长时间，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基本是按家庭出身录取学生的，穷人很少，犹太人很少，有色人种更少，男女还要分开。

在那个时候，哈佛、耶鲁校园里的学生，大概率他们的父母也是哈佛、耶鲁毕业，他们多半毕业于少数几个可以被称为“坑校”的高中，他们中的不少成绩可能并不出众，但他们几乎都有好的出身。

换句话说，二战以前这些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有着浓重的贵族制和世袭制的痕迹（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痕迹）。

从两本书的记述看，美国后来大学招生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缘起于这两所大学。

桑德尔在书中介绍，二战的爆发让国家之间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变得无比激烈，哈佛历史上的传奇校长詹姆斯·柯南特（1933-1953 年任校长）认为大学需要改变按出身招生的做法，而是应该不问出身，选拔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加以培养，他从 1939 年开始逐步开启了哈佛转向目前的贤能制的招生模式，也就是主要按照学生能力和成绩招生的模式。现在的美国“高

考” SAT 最早就是哈佛招生时参考的考试，后来慢慢成为全美各类大学录取时均会参考的考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就是第一批得益于这一改革才有机会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平民子弟。

耶鲁大学随后也迎来了自己的传奇校长金曼·布鲁斯特（1963-1977年任校长），布鲁斯特在任上也将耶鲁贵族制的招生模式转向贤能制的招生模式。

哈佛和耶鲁的转变，带动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转向贤能制，现在顶尖大学招收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高中生中的佼佼者。

根据能力而不是出身录取学生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给了普通人通过努力求学而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有很多人确实改变了命运。前面提到的托宾就是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等等也都是如此，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

但是桑德尔和马尔科维茨都指出，随着过去 40 多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分化，贤能制看似公平，看似给了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只是用另一种不同于贵族制或者世袭制的方式来固化阶层并造成教育内卷。

两本书都提到这么一个事实：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顶尖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 1%家庭的学生数量要比所有来自收入处于 50%和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数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常春藤大学中 2/3 的学生来自于收

入处于头部 20%的家庭。贤能制从结果上看并没有让太多底层的人有翻身的机会。

马尔科维茨的书写得更加激烈。他说，这种不平等从婚姻的选择就开始了，竞争的起跑线根本不是幼儿园，孩子连受精卵都还不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差距了。

2010 年时，美国有 25%的夫妻双方都有大学学历，而美国的成人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 30%，这意味着什么？基本是上过大学的跟上过大学的结婚，没上过大学的跟没上过大学的结婚，孩子在出生前家庭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就会存在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在孩子随后的成长过程中会越来越拉大，上过大学的父母平均每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会比只上过高中的父母多一个小时，会更多地给孩子读书，带他们去参观展览、画廊和上艺术课。

到三岁的时候，一个孩子如果父母是职业人士，这个孩子听到的词汇会比父母不是职业人士的同龄孩子多 2000 万个，认识的词多 49%。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794

